



## 红色乡建陕甘宁

申均明



● 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城

中国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只有近百年的探索实践，其步履异常艰难。

辛亥革命后，农村乡建开始萌芽，但中国社会依然政治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国家行为处处缺失。处在最基层的广大农村和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时时挣扎在死亡线上，受着牛马一般的苦罪，吃着猪狗一样的粗食。祖祖辈辈受人奴役和压迫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人人活得没有尊严。

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均寿命35岁左右。劳苦大众，命如蝼蚁，任人宰割，何其不幸。乡建、乡治的天空更是乌云沉沉，苦风寒雨，难见黎明。

中华民族依然在漫长的黑夜徘徊。多么黑暗的夜晚，总会有几颗闪烁的星星，在天边给人一点点光明向往；多么艰辛的事业，总会有几个奋力前行之人，在曲折折的山路上，为追求理想舍生取义。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抬眼万山从中，那些突兀而挺起的峰峦，总是让人升腾起昂扬的攀登斗志，敞开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可人世间的高山，却不见有几座可视为丰碑，可让人循迹的。

在中国乡建、乡治的道路上，是有几颗星、几座山，涌现出了一批仁人志士。他们不管不顾地扑下身子，用理想之念，仁义之心，描摹描绘乡村社会建设蓝本，如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张謇等。贤人们身体力行，体察民力之愿，以改造中国农村、农民之苦，并针对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施之以不同的形式，倡导并主持中国最早的乡村建设运动试验。

付出的心血是有成效的，可以看见在大地贫瘠之处，有毛草点燃，有嫩芽破土，但其亮度仅局限于很小的空间。所温暖的区域，绿意很浅薄，无法在被压迫、被蹂躏的土地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和复制；无法在黑暗的旧中国惠及全体人民大众。可谓是春风难绿江南岸。

原因很简单，是君子有仁，国家无义。黑暗的民国除争权夺利，轮番上阵扮演独裁以外，没有履行过什么责任和义务，山河处处缺失国家担当，政府行动。四万万人民群众的向往，一直低着头祈盼，盼望着东方出太阳，翻身把歌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伴随民国个人为主体的乡建、乡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土地上的人民实践，随着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大火，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熊熊燃烧。

延安时期，有纲领、有制度，全面实施红色乡建、乡治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为抗战全面胜利和全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新政府的基层“雏形”，获得了基层治理的“良方”，培养出局部领域的新农村、新农民，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缔造了滚滚洪流，巍巍靠山。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

天。太过寂寞和苦焦的黄土高原，不再是一道道山来哟一道道水，一道道山水泪蛋蛋泡。漫山遍野山丹丹花儿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万里云天，红旗招展，朗朗乾坤，遍地自由，红色革命土地上的乡建实践，如初春开犁般，犁出九万里神州第一犁。

这一行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权巩固的有力尝试，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大政治行动，汇聚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人民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闹革命两股新鲜力量。春雷一响震天吼，大地微微暖气吹。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得到四万万同胞的一致拥护。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辖陕西15个县，甘肃6个县，宁夏2个县以及神府地区，共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首府延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战时相对稳定的局部发展条件，由此也具备在特殊时期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政治条件和实践基础。边区人民好喜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赋予陕甘宁边区明确的建设任务：“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政治上的使命赋予，使为之一切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的责任担当，在陕甘宁这片广大的土地上进行广泛播种。

夺得鞭子，黑手扶犁，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试验遍地生根，茁壮成长。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我们党对它的领导更是赋予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同志不断强调，陕甘宁要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模范，使人民向往之；成为经济制度的模范，改善边区经济落后的面貌；成为文化制度的模范，使边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红色乡建，人民乡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稳建善治，改天换地。

问题大如山，困难迎面来。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作风，才可吹散乌云，赶走压迫，唤醒沉睡的土地，获得新生。

那时，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陕甘宁，像个叫花子，穷困潦倒，一身烂袄烂裤，荒山秃岭树木少，一年四季刮黄风，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十年九灾，三年两不收。人们形容这里的生活，是苦菜水泡黄连，苦不堪言。生产力极度落后，千百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多数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靠租种或给地主、富农当长工维持生计。粮食生产是牛耕驴拉、肩挑背扛、耕作粗放、广种薄

收，田不养人，地不养家，粮食产量极低。主要粮食作物小麦、谷子、糜子、高粱、荞麦等平均亩产在60斤到75斤左右。

频频上演的自然灾害，没一年空过，旱灾、雨涝、虫灾、雹灾、霜冻等，年年结伴横行，反复蹂躏。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三年两头旱，两头是大旱，春种不下去，秋收不回来是日常年景。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给边区人民造成极大的困难，卖儿卖妻时有发生。同时，社会封闭，文化落后，封建迷信盛行，日子是补丁打补丁，生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乡村一盘散沙。

即使在全力推进乡建、乡治的延安十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时常来袭，时刻考验着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资料记载，1940年，陕甘宁边区11个县遭受旱灾，12个县被雹灾侵袭，16个县洪水过田，损毁田禾20多万亩，粮食减收23.8万石，受灾人口53万多。1945年，边区再次遭受旱灾、雹灾和霜冻，受灾总面积达1788万亩，损失粮食65万石，受灾人口54万多。

毛泽东主席说：“困难真是大极了。”如此大灾，党中央挺身而出，领导生产救灾，实施生活救济，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硬是艰难地渡过难关。延安时期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以及边区精兵简政等措施，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的重要决策。

这些困难，我们不需要去翻阅那么多资料来佐证，看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补丁摞补丁的穿戴，我们就能明白当时的生活有多困难。我们也能从中深深体会到，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共产党人总是吃苦在前，良好传统在各个时期都有例证。一时的享乐，等不到永久的幸福。为公立党，难在为公解难，难在“公”与党谁该更早去体验幸福。

救灾是一时之事，更艰难的是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让农民翻身得解放。

彻底改变边区群众几千年未有之改变的被奴役、被压迫的酸楚生活、无良秩序，不是简单地改良运动就能解决，必须要来一场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革命运动。能否团结争取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进而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是共产党人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意志的执政理念。夯实了，千条万条河流会向你奔涌而来；创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定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建设，样样不离疼痛点；治理，招招施向要害处。共产党领导边区政府沉着应对复杂环境、尖锐矛盾，横刀立马，向日旧政治、旧文化、旧秩序开刀，团结带领边区大众埋头苦干，克服困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乡建、乡治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摆脱数千年的剥削和压迫，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性建设，挖根式治理，把昔日贫穷、闭塞、落后的边区建设

成举世称赞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政治最先进的区域。

队伍没有散，群众没饿死，陕甘宁边区东方红，太阳升，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天下归心。奔赴延安的一位热血青年的诗表达了这种崇敬：“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延安时期的乡建、乡治之所以能，是中国共产党行，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好。是因为坚持了一条最高的政治原则和两条切实可行的领导方法。即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实行组织起来和走群众路线。

共产党领导的乡建、乡治，不仅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崭新的社会局面，也为中国乡村发展开创了模范样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农为党本”。政治的使命，就是改变农村的萧条，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政治建设就得把“本党为农”的航向牢牢掌握在手里，为乡建铸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其实质由中共领导的但又是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边区政权以边区、县、乡三级构建，由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具有合法政权的性质。特殊的政治性决定特殊的施政纲领。即通过合法性贯彻政治性，以人民力量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政策，是在这个原则下首先得以贯彻并取得成功，进而使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

红色乡建，就是这样铸魂的，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乡建，先是思想奠基。这块土地是中华大地觉醒较早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具备群众基础，具有动员力量，但对于发霉发臭的封建糟粕，仍需下更大的决心予以彻底根治、坚决铲除。腐败思想、陈旧理念的改变，不是轻描淡写去刮几场风、出几个主意、剪几枝枯枝败叶就能见效的，也不是用扫帚扫一扫，用黄土垫一垫就能变过来的。要重起炉灶，挖土改水，重搭台子另唱戏，要重新立基铸魂，浇铸人民意愿，垒起阶级意志。让思想之石一石比一石方正，观念之墙一层比一层坚固。

谁来管理边区？谁来建设边区？不是国民党，不是地主老财，是共产党，是这块土地上一切拥护抗战的人民和力量，是一切为抗战出钱、出物、出人、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乡建、乡治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积极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以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服务抗战，形成共同管理边区、一起建设边区的新局面。

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指导的陕甘宁新乡建，在我们这个传统落后的国家，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以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所急所盼，开创出乡建新局面、新模范，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乡建之路，根本是政权建设之路。没有政权，就不能团结人民；没有政权，就无法领导群众。谁是领导？谁是主角？不是蒋介石，不是反动派，是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政府应是人民的政府，边区应是人民的边区，一切要以人民愿望进行伟大事业。期间，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围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建设，不断出台政策方针，并不断完善施政纲领，全面领导陕甘宁巩固政权建设行动。

乡建，政治为纲，人民为主。

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边区政权形成比较完整的权力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直接代表人民，选举各级政府，决定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并监督其实施。

实行民主政府领导。推行“三三制”，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三三制”既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维护和保障各抗日阶级、阶层、政党参政的基本权利；既增强共产党执政区域民主政权的代表性

和号召力，又大大提高边区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民主政府一杆子插到底。

实行民主真行究。1937年5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由特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随后在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对条例》又作了修改。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普遍性原则，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党派和团体的人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代表、议员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无记名投票。针对延安时期陕甘宁区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选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等情况，各地分别从实际出发，采取选民可普遍接受的形式多样的投票方式，如“背箱法”“投豆法”“画圈儿”“香火烧小孔”等方法。并坚持无记名投票原则，有效保障选民选举的自由和有效性。

占领乡村舞台。乡村是谁的政治舞台？应该谁来登台唱戏？唱给谁听？时代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不是旧主子，不是旧宗族，更不是旧势力。乡村是老百姓的乡村，乡治就得治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让老百姓登台，唱革命的新曲调。

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在政权的最基层建立乡支部和村支部，广泛吸纳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参与党的工作，为乡建、乡治发挥作用，使他们成为新的农村精英，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减租减息和农村选举运动中，让新的精英分子通过选举成为农村政权的直接领导者，支配农村基层权力。旧势力被迫退出农村政权舞台。

号召广大民众自愿加入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儿童参加儿童团，妇女参加妇救会，青壮年参加自卫军。此外，还发动群众组成各种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变工队、支前小组等。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建构，使散漫的社会、分散的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立密切联系。

各种彻底、新颖的建设方法和治理方式，深受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喜爱，更快地接受党的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和各种制度。边区农村普遍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实现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和全面的全面控制，有效领导。

政治上的乡建，得益于切实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和系列治本政策的实施，人民群众获益丰富。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彻底解放，而且在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建设上获得彻底翻身，从而激发起边区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热情。使他们投身革命之信念、建设乡村之信心更加坚定坚决。一切表现出的自觉行动，明显地改变着边区的社会状况，使边区以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昌盛的崭新面貌呈现在抗日烽火岁月里。

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进行了对比，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乡建，党注魂魄，人民注力量，其兴勃勃，势不可当。

“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农民幸福与自由最瑰丽的梦想、最伟大的憧憬。民以食为天，经济搞上去，老百姓的屁股就会坐在你的板凳上。延安乡建，既让老百姓“有其田”，还让他们“享其权”“得其利”。

(下转第二版)